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179–192.**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17vhjcb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视野与境界：从康拉德到蓝色诗学——王松林教授访谈录

程　文（Cheng Wen）　王松林（Wang Songlin）

摘要：本文是程文对王松林教授的学术访谈，追溯了王松林教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历程。访谈显示，王松林教授的研究从康拉德延伸至卡莱尔，同时参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并领衔提出“蓝色诗学”这一海洋文学批评理论的构想。王松林教授强调外国文学研究须以文本细读为根基，树立问题意识与比较视野，遵循“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理路，避免对经典作家的标签化解读。他建议青年学者择定可贯穿学术生涯的核心研究对象，由点及面逐层拓展。关于文学跨学科研究，他指出应立足文学文本体，做到“跨得出去，回得回来”。针对当前人工智能介入文学研究，他认可人机协同和 AI 的辅助作用，但强调具身体验、审美直觉与个体想象力在文学阐释中的不可替代性，主张文学教育的根本是情感教育，是一种培养感受他人能力或曰共情力的教育。面对纷繁多样的西方批评理论与“批评转向”，他反对盲目追逐学术潮流，倡导立足本土、确立文化主体性，在文明互鉴的视野中展开理论对话。谈及外语学科所倡扬的“守正创新”理念，他认为守正方是根基，不可一味追新求异；唯有沉潜于基础研究，方能逐步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约瑟夫·康拉德；托马斯·卡莱尔；蓝色诗学；本土意识；跨学科视野；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程文，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电子邮箱：chengwen@nbu.edu.cn。**王松林**，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学术兴趣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海洋文学理论与批评等。电子邮箱：wangsonglin@nbu.edu.cn。

Received: 23 Aug 2026 / Revised: 08 Oct 2026 / Accepted: 21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Title: Vision and Horizon: From Joseph Conrad to Blue Poetics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Songlin

Abstract: This is an academic interview conducted by Cheng Wen with Professor Wang Songlin, tracing the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of Professor Wang's long-term academic career dedicated to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interview shows that Professor Wang's research ranges from Joseph Conrad to Thomas Carlyle. Meanwhile, h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ioneered "Blue Poetics," a glocalized critical theory for the study of maritime literature. Drawing on his own research experience, Professor Wang emphasizes tha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ought to be rooted in close reading. He maintains that scholars need to foster a critical sensibility for problematization an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bserve the logic of "seeking differences from similarities and commonalities from differences," and guard against stereotypical readings of canonical authors. Regarding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he argues that scholarship must stay text-based: "reach out, yet return to literature." He also advises young scholars to choose a core research topic that can sustain their entire academic career, expanding progressively from a focal point to broader horizon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AI-assisted literary research, he acknowledges the value of human-AI collaboration and the auxiliary role of AI. Nevertheless, he underscores the irreplaceability of embodied experience, aesthetic intuition, and individual imagination in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maintaining that the essence of literary education is affective education—one that fosters the capacity for empathy, that is, the capacity to feel for others. Faced with various Western theories and "critical turns" prevalent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he cautions against uncritical following of fashionable trends and advocates rooting scholarship in Chinese contexts, construc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engaging in theoretical dialogu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s for the principle of "upholding tradition while pursuing innovation" advocated in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studies, he contends that priority ought to be placed on inheriting tradition over pursuing hasty innovation. Only by delving deeply into foundational research can we gradually build a discourse framework for foreign literary studies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Joseph Conrad; Thomas Carlyle; Blue Poetics; localize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interdisciplinary visio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uthor Biographies: Cheng Wen,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chengwen@nbu.edu.cn. **Wang Songlin**, Professor,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interests cover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s well as the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maritime literature. E-mail: wangsonglin@nbu.edu.cn.

程文：王老师您好！您的学术旅程从赣江之畔的乡村到东海之滨的港城，再走向世界，至今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已近四十年。这些年里，您在康拉德研究、卡莱尔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以及海洋文学理论与批评等领域均有建树。值此阶段性回顾之际，我想请您谈谈治学心得。第一个问题：您投身文学研究的初心是什么？

王松林：如果说从我 1986 年大学本科毕业开始，接着读研、留校工作、然后读博，那么到今年，弹指一挥间，恰好四十年。这四十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二十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只是在慢慢学习和积累，特别是在教学中不断丰富自己；后二十年才开始逐步窥见外国文学研究的堂奥，但也不能说有什么大的“建树”，个人经验、心得倒是有一些。不少学者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贵在长期积淀，人文学者真正走向深度研究的黄金时期，往往自五十岁，甚或六十岁之后方才开启，对此我深有同感。

要说“初心”，我想英语可以表达为 initial aspiration。我涉足外国文学研究的缘起，与其说是宏大的志向，不如说是机缘巧合与个人兴趣使然，缘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时代。记得当时我们英语专业大一、大二的精读课教材课文后面会附上一些短小精悍的名诗，有些还富有革命力量，老师要我们背诵。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几行诗：Rise 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to earth like dew/Which in sleep had fallen on you—/Ye are many — they are few. （起来，像睡醒的雄狮，/你们人数众多，不可征服，/赶紧挣脱你们的锁链，/像抖掉沉睡中落在身上的寒露，/你们人多，他们只是少数。——吴笛 译）。后来我才知道，诗句出自雪莱长诗《暴政的假面游行》（*The Masque of Anarchy*, 1819）。诗人试图借诗歌唤醒大众，抵抗压迫与暴政。这几行诗简洁有力，朗朗上口，我很喜欢，直到现在我还能脱口背诵。不过，真正让我走上外国文学研究这条路的，源于一次翻译的意外机缘。1986 年，我考取江西师大外语系英美文学方向研究生，读研期间，恰逢《江西翻译》创办，我斗胆把刘半农的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译成英文，记得原诗有这样几行：“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就与海洋有缘了）。完整的译文已经找不到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翻译灵感部分来自雪莱的诗《爱的哲学》（“Love’s Philosophy”）：“阳光拥抱大地，月光亲吻海洋”（And the sunlight clasps the earth/And the moonbeams kiss the sea:/What is all this sweet work worth/If thou kiss not me?）。我发现诗人的“诗心”和诗歌的意象是相通的。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报考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考试的一道题目是论述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观点：“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记得当时，我便以这两首诗歌的海洋意象为例展开阐发。这大抵便是随性读书所遇的机缘（affinity）。王佐良先生的英文论著 *Degrees of Affin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其书名中的核心概念 affinity（契合），在佛教义理层面亦可解作“缘分”，颇耐人寻味。在我看来，人生际遇与学术际遇本是相通的：总有某种事物、某种力量与你缔结因缘，于无形之中浸润，乃至深刻影响人的一生。我把译稿投了出去，刊登在创刊号上，还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橱窗里，于是我得到了某种心理满足，收获了一点虚荣。可以说，兴趣与好奇心驱使我走进文学研究的学术殿堂，而翻译是一把开启文学研究之门的钥匙，因为翻译让人领略文字的优美和玄妙。后来，我一直跟学生讲，翻译是细读、理解和研究外国文学文本的基石。我想，文学研究的初心，并非宏大的口号，而是对文字奥秘的好奇，对文字力量的敬

畏，对文字之美的向往——葆有这份好奇、这份敬畏、这份向往，便是我至今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源头活水。

程文：我们一直注意到，王老师的研究总能与学术前沿同频共振。您如何让个人兴趣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大趋势保持同步？又如何协调学院的学科发展与个人学术兴趣的关系？

王松林：这是个大问题。个人兴趣往往与学术考核、学院发展等外部压力发生碰撞。说实话，学术研究本身自有旁人难以理解的乐趣，但是一旦需要限期考核，可能就是一件非常艰难且痛苦的事情。我自己酷爱诗歌，一想到四月的春光，就会想起华兹华斯的一首诗《转折》（1798），诗人在诗中劝人别去啃那些“索然无趣的书本”，而应走进阳光与大自然，因为“春天树林的律动，胜过一切圣贤的教导”（“One impulse from a vernal wood/May teach you more of man.”）[①]。这首诗出自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诗人劝说埋头苦读的友人放下书卷，走出书斋，投身自然。由着自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读闲书，固然是一种自由的读书境界，可是身为高校教师，必须从事学术研究，只有学术研究才能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科研是高校教师的天职。因此，必须在个人兴趣与科研任务和团队特色凝练之间寻找平衡，既要应对聘期考核的压力，又要保留真正的学术热情。

学者的路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终身坚守一个领域，沉潜到底，许多前辈便是如此；另一种则随时代脉搏而调整研究方向，既保持核心兴趣，又不断接纳新思想，直面新问题。我兴趣较广，可能更偏向后者。譬如，现在我们迎来 AI 与数字人文的浪潮，传统的批评方法和研究范式必须有所调整。今天，单靠个人翻书查阅资料已难以应对海量文本，借助算法与数据库势在必行。我在多次研讨会上谈过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的结合，也撰文讨论过 AI 审美伦理问题[②]。不久前看到你已经把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写进课题申报，并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非常可喜。

然而，我始终提醒自己：不能沦为 AI 和数字化工具的附庸。过度依赖 AI 会削弱人的直觉和体验，扼杀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这些正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最宝贵的东西。2025 年四月下旬我受邀在全国英国文学年会上做了一个主旨发言，题目叫“甜蜜的科学：布莱克的科学观与艺术观”[③]，这个发言就是要借布莱克的话，提醒大家注意“具身体验”和“幻象”（想象力）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钱学森说：“科学固然重要，但想象力和艺术更重要。”走在学术前沿并不意味着俯首称臣于技术，而是在新工具的帮助下，把想象力推向更远的边界，同时保持警醒，警惕工具理性的渗透，不让机器磨蚀人类思考的锋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既不落伍于时代，也不迷失文学的灵魂。

程文：您多年深耕康拉德研究，在国内康拉德研究领域颇具影响。请谈谈阅读、研究康拉德对您个人学术之路与心性的滋养。他如何启发您？您又从中获得了怎样的成就感与视野？

王松林：我与康拉德的学术际遇多少是一种机缘。1986 年攻读英美文学方向研究生时，我的授课老师是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波兰裔英国教师，她向我推荐这位“跨海而来的现代主义先驱”。那时我初生牛犊，便把硕士论文直接写成《论〈吉姆爷〉的叙事结构》，从此与康拉德结缘四十年。康拉德站在世纪转折点：既开启现代主义，又承袭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道德关切；既背负帝国时代的思想遗产，又具罕见的全球视野——他有过 20 多年的航海经历，游踪遍及印度洋、太平洋、加勒比、非洲、东南亚、澳洲……如此辽阔的行迹使他的写作博大精深，且具有宽广的跨文化视域。康拉德可能比任何作家都更熟悉和眷恋海洋，他的小说有一种我称之为“恋海情结”（thalassophilia）的东

西，他是一个从海上看世界的作家。今天，不少学者都给康拉德贴上了“海洋小说家”的标签，但是我想，如果康拉德在世的话，他可能不愿接受这个标签。我研究康拉德，一开始也是把他作为单纯的海洋小说家来看待，但是随着对康拉德及其作品的深入了解，我觉得“海洋小说家”这个标签会限制我们对他笔下广博深邃世界的理解。研究康拉德告诉我一个道理：不要把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标签化。康拉德的小说往往探勘人性的灰色地带，讲人的“自我发现”，讲人的存在困境。《黑暗之心》的库尔兹也好，马洛也罢，以及《吉姆爷》的水手吉姆，都是“我们当中的一个”（“one of us”）。康拉德认为作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写人性，他说：“我的艺术是渺小的东西，若是缺乏对人性的关注，就没有生命”。譬如，他的小说 *Nostromo* 这个名字是拉丁语，翻译成现代英语就是“one of us”。*Lord Jim* 这一标题本身即构成一种悖论性的张力：“Lord”意味显赫的头衔与诱惑，而“Jim”却是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二者并置构成鲜明悖论，隐喻小说主人公浪漫化的赎罪历程，指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或曰“之轻”？）这一主题。小说由此引出一个深刻的人性叩问：平凡的 Jim 能否承载“Lord”所象征的这份沉重虚荣？推而广之，我们每一个人，又是否担当得起那份被外界赋予的沉重荣誉？康拉德曾评价他的朋友亨利 • 詹姆斯是一位“记录精致良知的史家”（historian of fine conscience）。其实，康拉德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写人的良心，写人的内心挣扎。他在《诺斯托罗莫》（*Nostromo*）的序言中就说，好的小说不是写一个坏人怎么坏，也不是写一个好人怎么好，而是写一个好人怎么坏，或者写一个坏人怎么好。康拉德说：“虚构出这桩劫案的来龙去脉并不合我的意趣”，只有当他意识到“窃取财宝的人未必就是个十足的无赖，他甚至可以是个有品格的人，是革命变幻的场景中的一名演员，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牺牲品”（《诺斯托罗莫 • 作者的话》3）。我觉得康拉德这话讲的很有水平，这不由得令人联想到英国新古典主义诗人亚历山大 • 蒲柏（Alexander Pope）的名句：“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犯错属人性，宽恕乃神性。”）因此，我们不难发现，罪错与忏悔构成西方文学反复书写的母题，霍桑的《红字》便是典型例证。读康拉德，我们可能会对人性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有更深切的领悟，更能把人置于全球跨文化语境中来考察。康拉德笔下的非洲人、马来人、南美人和中国人不断提醒我：外国文学研究要有跨文化视野，要有比较意识，要关注多元文化与政治文本的交织。

程文：确实如此，我深有同感，外国文学研究是多向度的。那么，您是怎样由康拉德研究转向卡莱尔研究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王松林：外国文学研究的比较意识和跨文化视域反过来塑造了我的研究路线，由康拉德研究我回溯到卡莱尔研究。柯林伍德有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文学研究当然要关注文学思想史，考察作家间的思想承续关系。卡莱尔被奉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思想界的“先知”，有“切尔西的圣哲”之称，他的思想影响了康拉德等一众作家。卡莱尔的思想底色源自加尔文教，但他的批判锋芒却指向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他提出“工作福音”之说，把工作当作抵抗功利主义的重要武器。功利主义将人性简化为趋乐避苦的计算，把社会降格为追求快乐总量最大化的利益机器，使人际关系沦为现金交易；它只看重行为后果，却忽视内在品格。卡莱尔则认为，工作不是换取享乐的工具，而是人的天职与神圣义务，劳动本身便具有道德价值。他的逻辑其实很朴素：人只有在具体工作中，才能一点点克服怀疑、懒惰、虚无这些现代病；通过尽责的劳作，人得以实现自我、塑造品格、召唤美德。他相信工作本身的高贵性，认为工作能唤醒人心中“神赐的力量”，“唤醒一切高尚的品

质”。换言之，工作既是通往完整人格与自我救赎的通道，也是对抗时代精神危机的一剂药方。我发现康拉德的思想深受卡莱尔倡导的“工作伦理”的影响。康拉德通过《黑暗之心》的马洛之口说：“我不喜欢工作——没人喜欢工作——但我喜欢工作中所含有的一种东西——即发现你自己的机会。你自己的真实——对你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真实——这东西是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的。别人只肯看见外表而已，而决不能说出那外表到底意味着什么”（*Heart of Darkness* 31）。我想，这大概是一个水手基于自己的职业伦理发出的内心独白。我十分认同这一思想，这些话常在我内心深处引起共鸣。这与我出身农村、经历饥饿贫困、饱受体力劳作的艰辛体验吻合，也让我对“学术研究”这份孤独的工作怀抱敬意。

我发现卡莱尔和康拉德都拥有一种悲悯的浪漫情怀——他们均以抵抗的姿态面对机械时代。我认为，但凡伟大的作家，内心都葆有这种浪漫情怀。另外，康拉德和卡莱尔还有一个共通之处：他们都深受东方思想的影响。譬如，康拉德《黑暗之心》的马洛形象就有佛陀的影子，我曾在清华大学主办的“英美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做了一场名为“‘冥思的佛陀’：《黑暗之心》中的静默与凝视”的线上学术报告，论及康拉德思想的东方因子。卡莱尔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人甚至称他为“欧洲的孔子”。他十分赞赏中国科举选拔制度，对西方民主制度颇有微词。于是，我用英文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过去与现在：卡莱尔、贤能政治与“中国模式”》（Past and Present: Thomas Carlyle, Meritocracy and the ‘China Model’），发表在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的《社会与政治哲学学刊》（*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上。这次学术的“跨界冒险”源于文学视角，却也因康拉德—卡莱尔路径而自然生长。对于我来说，康拉德是一座丰富的宝藏，足以毕生挖掘；也是一种方法论和精神旨归——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对话中保持思辨张力和问题意识，恪守工作伦理和学术伦理。正因如此，我常鼓励年轻学者：治学当先深耕一隅，成为某一专门领域内难以被超越的专家，由专而博。正如一句英文箴言所言：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我认为，做研究要选择能“养你一生”的课题：它会反哺你的学术，也会塑造你的心性与世界观。

程文：康拉德本是水手出身，海洋既是他谋生之所，也是他的文学母题，因此，康拉德研究想必正是您走向海洋文学研究的起点。多年来在您的带领下，宁波大学的海洋文学研究已形成鲜明特色。能否请您谈谈您本人以及宁波大学团队在这一领域的探索？

王松林：好的。我想从三个方面来介绍——理论构建、批评实践与学术推动，彼此相辅相成。

一是理论构建：提出“蓝色诗学”框架。近二十年来，西方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出现了“新海洋学”或曰“海洋转向”的浪潮，由此产生了“蓝色人文研究”（Blue Humanities）。我和我的团队在此基础上提出“蓝色诗学”（Blue Poetics）的构想[④]，主张以海洋而非陆地为参照系，从跨学科视域研究外国文学中的海洋与民族性格、海洋与帝国想象、海洋与资本主义、海洋与经济贸易、海洋与现代性、海洋与全球化、海洋与生态、海洋与科技等议题。“蓝色诗学”强调海洋的流动性、连通性与去中心化特质，意在修正传统陆地中心的文学观，为中国的海洋文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蓝色诗学”立足海洋思维（蓝色思维），把原本客体化或工具化的海洋视作一个有生命的、能动的、与人类平等的主体来看待。我们认为海洋参与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与精神建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归纳“蓝色诗学”的学理特质：**本体论的去二元性**——打破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陆

地与海洋的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提倡“人海共生”的理念；**认识论的流动性**——突破陆地人文崇尚稳定、封闭、秩序化的认知逻辑，倡导以海洋的流动、跨界、互通与共生为核心认知的“蓝色思维”；**方法论的跨学科性**——摒弃单一学科的封闭研究模式，整合生态学、历史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跨学科知识，吸收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物质批评、空间理论等批评方法，重审人海关系、重构海洋文明叙事、反思现代性海洋危机。总之，“蓝色诗学”旨在颠覆“陆地为中心、海洋为边缘”的认知结构，强调海洋在人类文明、生态系统、审美生成中的主体性地位。需要说明的是，“蓝色诗学”并非是西方蓝色人文理论的照搬复刻，而是秉持中国立场，立足本土意识对其加以批判性重释，特别是融合中国海洋文学/文化中以海为田、向海而生的耕海传统及其背后“和合共生”的海洋审美资源。第 15 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年会即将在杭州召开，我策划并主持了一个分论坛，主题为“全球文明互鉴与中外文学的海洋生态伦理书写”，聚焦海洋作为生命主体、人类与非人类在海洋空间中的共处伦理、跨文化视域下海洋正义与生态责任的文学表达等议题。论坛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立足中外文明互鉴，关注东西方文明在海洋生态观念上的异质性与对话空间，探讨不同文明传统中海洋伦理想象的差异与对话，以及海洋文学如何参与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我想藉此来丰富“蓝色诗学”的理论构建。目前，“蓝色诗学”的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和理论品格的海洋文学批评话语体系，需要更多从事中外海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同仁共同努力。

二是批评实践：从文本细读到类型史书写。理论必须落地。譬如，我个人将“蓝色诗学”理念用于分析康拉德早期小说中印度洋贸易书写与东西文化冲突，揭示“海洋自由”神话背后的帝国霸权与宗教及经济的交织。再如，我把目光扩展到古英语史诗与维京海洋文化，分析《贝奥武甫》中的船葬、鹿厅及其丹麦属性，以考古材料佐证文本历史性，也检验了“蓝色诗学”关注空间－权力－文化交互的解释力。在教学中，我选择 A.S.拜厄特的短篇小说《大海的故事》作为海洋生态文学批评文本，引导学生关注全球海洋生态危机，树立蓝色生态理念。此外，我和我的团队编写出版了教材《英美海洋文学选读》，该书也是一部简明的英美海洋文学史。我们始终注重以研促教、以教促研——这部教材已用于研究生课程“英美海洋文学研究专题”，我们还鼓励学生把海洋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选题，取得了一些成果。

三是学术推动：搭建国内外合作平台。宁波大学地处海港城市，我们依托浙江省高校“外国语言文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立了“宁波大学世界海洋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洋强国’语境下的英美海洋文学流变”，结题成果优秀。在推动海洋文学研究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方面，到 2026 年为止，我们连续举办了 9 届“海洋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为“蓝色诗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026 年，我们创办了中英文国际期刊《海洋文学与文化学刊》（*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旨在为海洋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专门的学术交流平台。在出版层面，我策划出版了 10 卷本《世界海洋文化与历史研究译丛》，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将全球海洋史与海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译介给国内学界。该丛书获得第四届“盐田海洋图书奖”最高奖“灯塔奖”。无论是理论创新、文本批评还是平台建设，我们都在努力把宁波大学打造成国内外国海洋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希望与更多同仁一道，开辟“蓝色人文”和“蓝色诗学”研究的新航线。

程文：除了海洋文学研究，您还积极投身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著有系列文章和专著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请您介绍一下您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历程。

王松林：很高兴谈一谈这一研究方向的来龙去脉。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创建的文学批评方法，由聂珍钊教授首创，至今已有 20 多年。我师从聂珍钊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较早参与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还加入了聂珍钊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并成为子课题《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聂老师领衔的这个重大项目的结题成果获得教育部第九届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这说明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内外学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有一套严密自洽的批评术语，对文学的发生机制、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做了原创性的思考，特别是聂老师提出的人类文明发展三阶段论（即“自然选择”“伦理选择”“科学选择”三个阶段）[⑤]，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典范。我本人在文学的伦理教诲与审美功能之间的关系上做了一些思考，在“脑文本”概念的定义及其形成的科学认知机制、美学伦理学和 AI 伦理等方面做过一些探索，先后写了若干文章在《外国文学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Kritika Kultura* 、*ANQ* 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目前我在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担任副秘书长，与同事一起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国际影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其实，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性，我在多次课堂与研讨中给学生强调，文学可以让我们在审美的体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善，追求真。我希望学生可以借由文学浸润心性、涵养人格，努力成为内心温润、心怀向善的人。文学作品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一个人抵达善的必备条件。朱光潜先生曾借用雪莱《诗辩》里的话论述想象力与美德之间的关系：“诗能促进美德，盖因诗乃‘想象之表现’。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径是想象”（44），他进一步阐发道：“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象”（44）。我十分认同这一观点，这令人联想到济慈提出的“客体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两者颇有共通之处。我认为文学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由想象生出共情，由共情走向仁爱，由仁爱萌发道德心。正因为此，对于文学教学工作，我乐此不疲。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让我领悟了一个道理：文学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情感教育，一种培养感受他人能力或曰共情力的教育。我以为，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一个懂得感知他人的人，无论是否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其本身便值得尊敬。对此，我有专门论述。[⑥]

程文：如果让您挑选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作为自己的学术代表作，您愿意选择哪一部或哪一篇？

王松林：迄今为止，在学术上很难说我有什么“代表作”，我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满意。如果硬要说我自己下了一番功夫来写的，是两篇英文文章。一篇是 2012 年发表在《剑桥季刊》（*Cambridge Quarterly*）上的文章：“瑞恰慈与吴宓：基础英语、白话文与《中庸》”（I. A. Richards and Wu Mi: Basic English, Vernacular Chinese, and *Chung Yung*），是从比较文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瑞恰慈与吴宓的学术思想交往。20 世纪 30–40 年代，瑞恰慈在中国致力于推广“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的 BASIC 是 British-American-Scientific-International-Commercial 等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1929–1930 年，瑞恰慈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与吴宓是同事，两人有过密切的学术交往。瑞恰慈把“基本英语”看成是一项“语言工程”（“linguistic engineering”）。事实上，他想在中国普及

“基本英语”并由此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接受英国和美国的现代科技和商业精神。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有一句名言：“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⑦]。作为语言学家，瑞恰慈非常清楚语言之于思想的影响和作用，他希望通过“基本英语”来阐释、澄清和克服跨文化概念在移植中产生的问题。现在看来，他的“语言工程”背后具有很强的帝国（政治话语）意识。瑞恰慈十分崇拜孟子，著有《孟子论心》（*Mencius on the Mind*）一书，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e College）的老图书馆（Old Library）设有瑞恰慈档案特藏室（I.A. Richards Collection），我有幸在那里参观过他留下的手稿和一些中国书画收藏品。出于兴趣和学术需要，我研读了有关瑞恰慈和吴宓的传记、日记以及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科学与诗》等著作。另外一篇是我刚刚提到的《过去与现在：卡莱尔、贤能政治与“中国模式”》，也是一种跨界研究的尝试。虽然在行家看来我是个门外汉，但我觉得自己“跨过去了”。我看了一些关于西方政治和历史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和文章，如洛克、黑格尔、穆勒、贝淡宁、熊彼特、福山、欧立德等人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著述，结合我对卡莱尔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的研究，算是“从门缝里看世界”。

这两篇文章都是出自我的学术兴趣，写作过程很烧脑，却充满乐趣。前面那篇是关于语言哲学、文学与东西文化的关系，这篇涉及文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以及中西政治比较。我觉得外国文学研究要有本土意识和跨学科视野，要有扎实的文献支撑，研究者要学会比较和打通。这两篇英文论文都涉及中国和英国的思想史，我花了不少功夫来阅读相关文献，虽然写完后发现尚存不少遗憾和缺陷，但整体上感觉自己还是尽力了。然后，著作方面可能就是《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也花了较多的心血。其实一个人真正认真读书、完全静心做学问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在大学学习那几年，尤其是读研和读博那几年，参加工作以后，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我一直在做行政工作，很多时间都被牵扯过去了，只能利用寒暑假和晚上的部分时间读书和写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去平衡学院行政工作与自己科研之间的关系。

程文：现在是数字人文时代。我在读文学论文的时候会产生一点困惑，用统计方法、语料库、数据库，包括叙事学中那些高度形式化的模型，去定义和描述文学，这类研究在描述与归纳的层面确有其效力，但我总觉得它离文学真正打动人之处还隔着一层。在我看来，文学终究是对人心灵的触动或震撼。可是另一方面，数字人文的兴起，又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松林：我与你几乎同感，但是呢，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还可以探讨。说到这个话题，我就又想到我上面提到的华兹华斯的那首诗《转折》，其中有一节说：“自然挥洒出绝妙篇章；/理智却横加干扰，/它损毁万物的完美形象/剖析无异于屠刀”。（Sweet is the lore which Nature brings;/Our meddling intellect/Misshapes the beauteous forms of things/We murder to dissect.）就是说，像手术刀一样理性地去解剖一部文学作品，实际上“无异于谋杀”文学的生命。文学作品的伟大，往往蕴藏于文本中理性难以穷尽之处，也就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层意蕴。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文学作品可以用 AI 来“远读”，正如二语习得可以用实验数据和图表，翻译学可以用语料库，文学研究也可以用数据来做定量分析，佐证一些观点，甚至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个无疑是有益的。就外国文学研究而言，完全可以用 AI 来做一些定量的分析，但是文学研究最终要抵达的东西，肯定是刚刚你讲的，是一些心灵的东西，是心灵的触动或感悟。纯粹的数据和定量分析，我们也不必排斥它，但它应该仅仅是辅助的工具。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和未来的通用人工智能（AGI），必将重塑人文社科研

究范式，人机协同研究会成为大势所趋。AI 擅长文献挖掘、数据统计、文本归纳这类流程化工作，可以拓宽研究的材料边界。但问题意识、价值阐释、人文共情，仍是 AI 无法取代的。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时代的研究者更具备专业能力和判断能力：甄别信息真伪、提炼真问题、做出价值判断，并恪守学术伦理。无疑，这对学者的学识与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过，我个人对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过度应用深感忧虑，尤其不赞成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推广 AI。青少年的自控能力尚未成熟，AI 会损害过程性学习，消解学生探索试错、直面困境、在挫折中不断成长的体验，进而削弱其独立思考能力。AI 可能更适合具备扎实专业基础、强大的提问能力和问题意识以及价值判断能力的群体，作为研究辅助工具使用。即便如此，我们仍不可忽视 AI 对文学教学与研究带来的负面效应：它会消解文学阅读中的具身认知体验，弱化人们对文本语言的深度细读与个性化阐释。我甚至担忧，倘若任由人工智能无节制地发展，人类或将面临灾难。但愿这只是杞人之忧。所以，作为人文学者，我们需要警惕技术、资本、权力与媒体之间的利益合谋，更有责任从人文与伦理维度，对 AI 的迅猛迭代保持审慎审视与风险预警。

就文学研究而言，我十分认同你刚才的观点：文学即人学，文学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究人的心灵世界。人是完整的存在，是思想、情感与肉身交织而成的复合体，不可割裂审视。人的内在状态繁复多变，情感更是难以衡量、无法量化。至少在当下，AI 尚难以捕捉和把握人类这种具有涌现性的情感与意识，对吧？文学阅读也好，文学研究也罢，我觉得深度阅读要比广度阅读更有价值，我说的深度阅读，是指读者要在字里行间感受文字的力量，触碰文字迸发的思想火花。也就是说，你阅读的具身感受（身体的和心灵的），你的直觉和文学审美敏感非常重要。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如何读书》一文中说得好，她说文学批评要有四个阶段：细读、理解、比较与判断。我认为，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学问之道。中国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一定要有比较意识、本土意识和批判意识，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扎实的文本细读，对原著的深入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发现问题，然后依据与作品相关的各种材料开展历史、文化、政治等多层面的探究。

程文：您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我想这可能与你广泛的学术交往很有关系。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学术交流与学术友谊在您的研究过程中的作用？

王松林：不少人以为文科的学术研究，仅凭一支笔便可完成。受传统治学观念影响，文科研究往往被视作无需团队协作的个体事业：一支笔，一本书，一杯茶，一壶酒，一张琴，一溪云，自有一番别样的意境。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个人觉得学术交往或学术朋友圈还是非常有益的。譬如，我个人在来到宁波大学后，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组织召开了很多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我自己也应邀走出去参加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代表宁波大学，当然也代表自己做大会发言，期间就结识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学界泰斗，其中不少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譬如，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专家、耶鲁大学 Claude Rawson 教授, 美国当代诗歌批评家、斯坦福大学 Marjorie Perloff 教授, 卡莱尔研究专家、爱丁堡大学 Ian Campbell 教授等等，我对这些专家或做过学术访谈，或写过他们的书评，或翻译了他们的学术专著，或在他们的帮助下撰写了论文。上面提到的三位国际知名学者我都邀请到宁波大学讲学。这些学者很有思想，他们的学术视野都很开阔，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会海阔天空地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我们之间就会有思想的碰撞。事实上，思想碰撞于科研而言至关重要。西谚有云：Mind works upon mind，不同思想可相互启迪，由轻松交流催生的灵感远胜于独自闭门求索。譬如，

我跟你同一个办公室，我们有空时就一起闲聊一些学术话题，你对雪莱和布莱克的洞见让我特别受益。我写的有关布莱克的文章和做的有关布莱克“甜蜜的科学”的讲座就深受你的启发。你翻译布莱克诗歌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也给我很大的触动，值得我学习。你是一个出色的布莱克研究专家，你来讲布莱克和浪漫主义一定会更好、更深刻。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因此，我一直跟国内外一些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和中青年翘楚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我个人还是受益的，我非常感谢学界前辈和专家的提携，我个人的成长，包括我们学院学科建设的发展，其实都是与学界前辈和师友的支持分不开。所以，只要我们学院年轻老师有什么需要帮助，我总是尽我所能去帮大家向外推荐，我觉得这是我也应该做的事情。我希望我的同事要走出去，多参加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议。

程文：最后，请王老师再结合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给我们老师和同学在学术研究方向或者方法上提一些建议。

王松林：事实上，我个人认为文学研究可能没有什么趋势或前沿，它不像理工科那样。所谓学术研究前沿或趋势——我说的是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在我看来很多都可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至少文学研究是如此。我在研究这个，我就说这个是发展趋势，他在搞那个，他就说那个是前沿、是趋势。所以，大家会看到很多“趋势”或“转向”：语言转向、文化转向、认知转向、生态转向、空间转向、物质转向……，我自己这些年在研究海洋文学，我就说“海洋转向”（笑）。其实，哪有那么多“转向”？！时下学界还有不少人说，文学研究现在是“跨学科转向”。我想，这一说法似可商榷，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或曰“伪转向”。考诸学术史，不难发现，但凡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研究，从来都是在与哲学、史学、伦理学、美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对话中展开的。跨学科不是文学研究的新现象，而是其一以贯之的存在方式。“转向”之说，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文学研究固有的丰富性、开放性与多元性。另外，关于文学跨学科研究，我想在方法论上做一点澄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固然可为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与工具，但文学跨学科研究应当始终以文学文本为根基，从文学文本出发，在问题的驱动下进入其他学科的视野，最终仍须回归文学本身。换言之，文学跨学科研究既要跨得出去，更要回得回来。

我们注意到，当代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本质上是跨学科的，且很多都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如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族裔批评等，这些批评理论背后自有其滋生的社会文化土壤，它们大多是后现代思潮的产物，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去中心化、怀疑和颠覆“宏大叙事”，其中有许多观念（如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但是，也有学者如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不太喜欢这样的批评，那些从政治、道德、宗教、性别、种族等角度进行文学批评的人都被他扣上了一个大帽子：“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他力主文学批评要回归文学内部的审美批评，要聚焦“西方正典”，坦言自己就是要“挑战左的和右的文化政治学，因为它们正在摧毁批评，也许随之还在摧毁文学本身”（45）。布鲁姆的观点招致了诸多学者的批评。伊格尔顿便指责他人为地割裂了审美与意识形态、性别、阶级等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的关联，忽视了经典生成背后复杂的权力建构。事实上，布鲁姆并非全然否认文学的社会维度，他所反对的，是以政治批评取代审美批评。我们应当看到，布鲁姆的审美批评思想是在西方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日益过度政治化的背景下提出的；他或许正是试图以矫枉过正的激进姿态来扭转这一倾向。若果真

如此，我们或许应对他多一分理解。的确，我们要警惕用政治和道德标准取代审美评判。优秀的文学研究要对作品的文字肌理和叙事形式保持充分敏感，立足文本本身，进而实现审美、政治、伦理等多个批评维度的辩证统一。

在论文选题问题上，我想对研究生说，写论文时首先必须问自己：文章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伪命题？你是在什么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问题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可能有一种执念，那就是，文学研究未必就是越“新”的越好；相反，文学研究要向后看，要回望古典和传统。所以，我总是鼓励研究生选择古典或经典的作家作品来研究。当然，角度、思路和材料必须是新的。谈到研究方法，我发现不少同学写论文，习惯套用西方流行理论解读作品，文中堆砌晦涩术语与外来观点，缺少文本细读，也缺乏文献考据。这类论文往往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难有独立洞见，也就谈不上创新。在我看来，中国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当立足本土立场，兼具比较视野。我们要先吃透域外理论，再在此基础上建构自身的批评话语，切忌简单照搬。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话语自主意识诚然可贵，但倘若中文功底欠缺，在中国文学、文化、历史与哲学方面学养不够，想要建构自主话语体系便无从谈起，最终难免沦为空洞的口号。这其实正是我们这一代许多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者的短板，我本人亦不例外。所以，外语学者的文史哲素养，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愿与诸位同道共勉。

我们知道，当代大学承载着四大核心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当前，外语学科热议的话题之一是“守正创新”。在这个问题上，我或许算是个“保守派”。在我看来，大学人文教育仍应以“守正”与“传承”为要，尤其在本科教育阶段，不宜盲目追求创新，也不必急于追逐创新——正所谓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不过，既然你提出“外国文学的研究趋势”这个问题，我还是要回应一下。譬如，申报国家课题还是要尽可能紧跟“前沿”，或者准确地说，是要对接国家的战略需求，这个就是“趋势”。然而，有些“前沿”或“趋势”可能未必就是你自己专业特别擅长的领域。但是，你想要拿国家课题，你就要领会国家人文社科发展的战略，你就要有国家意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近日我评审了一个课题，我这里不妨分享给大家。课题使用了“全球南方”这个概念来研究英国文学的地缘政治书写，讨论的问题是英国小说里面涉及到的南亚和东南亚（如印度和缅甸）、非洲、加勒比地区，还有印度洋，南太平洋等等。我认为这个选题就非常好，建议可以申报重点课题，因为课题结合了当下的趋势和国家战略。文学研究可以介入社会现实，为国家提供文化与思想层面的智力支持，外国文学研究亦能够为区域国别研究贡献独特的观察视角。但对于部分选题切口小、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是否一定要紧随热点趋势，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不少研究有自身固有的学术根基，诸如文史文献考据、古典文学方向的成果，很难直接对接“国家战略”，而这类基础理论研究本身同样具备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但是，一些研究工具可以是新的，比如 DeepSeek 或 GhatGPT。如果要讲趋势，现在似乎所有的学术会议前面都加上了 AI，不是吗？AI 与外语教育，AI 与翻译，AI 与外国文学研究等等。如果说有什么“趋势”的话，数字人文研究大概是一种大趋势。但是，我认为，一个踏踏实实的做学问的人，他不会太紧跟趋势和蹭热点，他一定是牢牢守住自己的自留地，然后去持久深耕，做出成绩，形成特色。这样的研究出成果可能会慢一些，但一定会有价值。追求“趋势”的研究成果可能来的快一些，但未必就一定有高质量。这是一个悖论，孰是孰非，难有定论。这是我个人的谬见，不见得正确，欢迎大家批评！

程文：王老师分享了自己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经验，就外国文学研究的路径、方法和趋势以及文学教育和数字人文等问题做了深刻的回应，我受益匪浅，颇受启发。十分感谢王老师接受我的采访。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Cheng We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2221-5140

Wang Songli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1972-2513

注释【Notes】

① 此诗体现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浪漫主义诗学观，诗人认为大自然是最伟大的导师，能够给予人类书本无法提供的鲜活智慧与精神慰藉。标题“The Tables Turned”源自英语习语 turn the tables，原指古西洋双陆棋，本义是棋盘双方位置调转，后暗喻价值、立场、优劣地位和局面的彻底颠倒。这首诗与另一首名为《劝告与答复》（Expostulation and Reply）的诗是姊妹篇。在那首诗里，朋友劝华兹华斯要多读书；而在这首诗里，华兹华斯彻底反转立场，呼吁朋友丢掉书本，走出书斋，拜大自然为师。译者将标题译为“转折”似乎让人费解，王佐良先生将之意译为“反其道”，相较之下，更贴切传神，且富有哲思。译文选自《华兹华斯诗选》，杨德豫、楚至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93–294页。王佐良译文《反其道》参见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年，第237页。

② 详见王松林在 *ANQ:A Quarterly Journal of Short Articles, Notes and Reviews* 2025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AI审美主体性的文章“Aesthetical Ethics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AI Aesthetics”。

③ 这是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研究分会第十五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2025年•成都）上做的主旨发言。之后，王松林教授还应邀在其他高校做了关于科学与文学、理性与情感、具身认知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系列讲座。

④ 详见王松林：“蓝色诗学”：跨学科视域中的海洋文学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35–43页。

⑤ 详见聂珍钊、王松林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8–32页。

⑥ 参见王松林：“情感赋能视域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外国语文研究》，2023年第2期，第11–17页。

⑦ 这句话德语版《逻辑哲学论》（5.6）的原文为：“Die Grenzen meiner Sprache bedeuten die Grenzen meiner Welt.”翻译成英文为：“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5.6.)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Translated by Jiang, Yilin Press, 2005.]

约瑟夫•康拉德：《诺斯托罗莫》，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Conrad, Joseph. *Nostromo*. Translated by Liu Zhuhuan, Yilin Press, 2001.]

Kimbrough, Robert. *Heart of Darkness: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1988.

聂珍钊、王松林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editors. *A Theoretical Stud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王松林：《“蓝色诗学”：跨学科视域中的海洋文学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 年第 3 期，第 35–43 页。

[Wang, Songlin. "'Blue Poetics': A Study of Maritime Literature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3, 2023, pp. 35–43]

王松林：《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Wang, Songlin. *A Study of Ethical Views in Conrad's Novel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王松林：《情感赋能视域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外国语文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11–17 页。DOI:https://doi.org/10.16651/j.cnki.fllr.2023.0030

[Wang, Songlin. "Teaching Foreig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Empowerment."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no. 2, 2023, pp. 11–17.]

王松林主编：《世界海洋文化与历史研究译丛》（10 卷本）。海洋出版社，2025 年。

[Wang, Songlin, editor. *Translated Series of World Maritime Culture and History Studies*. 10 vols., China Ocean Press, 2025.]

Wang, Songlin. "Brain Text，Brain-to-Text, and the Mind Style of Literature", *Kritika Kultura*， 2021/8/1，vol.37， pp. 476–493.

Wang, Songlin. "I.A. Richards and Wu Mi: Basic English, Vernacular Chinese and Chung Yung", *The Cambridge Quarterly*, Spring, 2012. pp. 66–81. DOI: https://doi.org/10.1093/camqtly/bfr044

Wang, Songlin. "In the Company of Claude Rawson: Revisiting the Writings of Barbarism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vol. 9, no.1, 2025, pp. 197–208.

Wang, Songlin. "Past and Present: Thomas Carlyle, Meritocracy and the 'China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 vol. 4, no. 1, 2025, pp. 54–69. DOI: https://doi.org/10.3366/jspp.2025.0099

Wang, Songlin. "Poetry is the Discourse that can only be Re-read":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arjorie Perlof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vol. 8, no. 2, 2024, pp. 317–330.

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 年。

[Wang, Zuoliang. *A History of British Poetry*. Yilin Press, 1997.]

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选》，杨德豫、楚至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20 年。

[Wordsworth, William. *Selected Poems of William Wordsworth*. Translated by Yang Deyu and Chu Zhida, Time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0.]

朱光潜：《大美人生 —— 朱光潜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Zhu, Gaungqian. *The Beauty of Life : Zhu Guangqian's Essays*. Beijing: Peking UP, 2008.]